

前 言

國家認同作為個體對國家的心理歸屬與情感依附，是維繫國家統一與社會凝聚的核心紐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創新性實踐，更是新時代增強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感，以及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重要平台。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粵港兩地在教育、就業、生活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選擇赴粵求學，形成了規模可觀的在粵香港大學生羣體。據香港教育局數據，2021/2022 學年至 2023/2024 學年，在內地高等院校就讀的香港學生人數從 18,430 人增至 23,317 人，增幅達 26.5%。其中，廣東省憑藉地緣相近、文化相親的優勢，成為香港學生赴內地升學的首選目的地，在粵就讀的香港大學生佔內地同類學生總數比例高達 60% 左右。

在粵香港大學生處於「一國兩制」交匯的獨特場域：這一羣體既要在內地高校完成學業及融入新的生活圈層，又與香港本土社會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這種「雙重在場」的生活狀態，使其國家認同的塑造既不同於在香港本土求學的同齡人，也有別於在內地成長的其他青年羣體。他們如何理解「中國人」這一身份內涵？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其國家認同經歷了怎樣的演變軌跡？其國家認同的重要影響因素是甚麼？這些問題不僅關乎這一羣體自身的成長發展，更對理解香港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建構具有典型意義。因此，深入探究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現狀、影響因素及形成機制，對於完善跨境教育政策、優化青年工作策略及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本書基於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現狀的實證分析，旨在準確把握該羣體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及影響機制。本研究不僅致力於探索提升在粵香港大學生羣體國家認同的可行路徑，更期望能充分發揮這一羣體的獨特橋樑作用，帶動更多香港青年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而增強香港青年與大灣區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力求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建設提供有益啟示，通過發揮灣區的人文聚合功能，服務於港澳特區的長期繁榮與穩定。

第一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奠基，系統闡釋了本書的研究對象、核心概念與理論依據。國家認同並非單質概念，而是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複合體。在香港語境下，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有着本土意識強於國家認同、文化認同高於政治認同的層級結構。本研究以「一國兩制」理論為制度分析基礎，借由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揭示物質交往決定精神交往的唯物史觀邏輯，並以羣際接觸理論闡明跨境接觸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作用機制。這些理論在制度、交往與心理層面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分析框架。

第二章基於國家認同建構的歷史文化傳承與社會互動建構兩種理論範式，通過問卷調查展開了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實證分析，運用因子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型識別出影響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五大核心因素：大灣區經濟發展、傳統文化認同、國情教育、媒體環境塑造及人際交往質素，為後續各章深入剖析這些因素對這一羣體國家認同的影響提供了實證基礎與路徑指引。

第三章遵循「宏觀歷史嬗變—中觀融合進程—微觀實證檢驗」的邏輯進路，系統考察粵港澳區域經濟發展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機制。研究追溯香港經濟變遷與身份認同的共生演化歷程，指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建構始終嵌套於經濟發展結構性變遷之中，印證社會

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邏輯。進而，從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單向優勢」到新時代「雙向融合」的經濟格局重塑引發了香港青年身份認同焦慮，經濟融合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實證數據顯示，在粵香港大學生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認同與其國家認同呈顯著正相關，灣區建設通過將國家戰略與個人發展機遇相聯結，使「國家」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賦能者」。本章核心結論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構成了培育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獨特「實踐場域」，基於「發展型利益共同體」的國家認同在漸進式融合中實現內化。

第四章聚焦中華文化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深層影響，從歷史溯源、學理探討到實證分析逐步深入展開。香港文化植根於嶺南文化這一中華文化重要分支，殖民管治未能切斷深植於華人社會的中華文化血脈。這一章從這一歷史溯源出發，探討香港社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展現出對殖民價值改造的系統性抵抗與代際傳承的堅韌性。這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建構奠定了文化基石。實證數據顯示，在粵香港大學生文化認同呈現結構性：對文化古蹟、經典作品的「知識性認知」得分較低，對傳統節日、文化活動的「情感性歸屬」得分較高，而對「文化血脈」的「身份性錨定」得分很高，並證實中華文化認同是影響國家認同的最強正向因子。本章核心結論表明，以「情感性歸屬」為核心的體驗式文化認同構成驅動國家認同感提升的重要引擎，對「文化血脈」的根源性確認則奠定國家認同不可動搖的心理基礎。

第五章首先從認知社會學與政治心理學視角確立國情教育作為培養國家認同核心渠道的理論基礎，論證通過認知奠基、情感催化與行為塑造三重機制發揮國情教育對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構建的作用。為理解在粵香港大學生認同建構的國情教育特殊性，本章繼而回溯香港國民教育從殖民管治時期到回歸初期，再從「國民教育科風波」至《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頒佈後的完整發展歷程，揭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薄弱的國情教育歷史根源與政策語境。基於實證調研數據，本章的核心發現表明廣東高校國情教育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提升作用並不顯著，這一困境源於多重結構性制約：「速成式」補償教育不符合認同形成的長期濡化規律；教育內容供給與學生需求錯位，學生反感空洞說教卻對歷史文化課程更有真實興趣；單向灌輸的教學形式壓抑香港學生慣常的批判性思維與參與需求；家庭背景、前置教育、社交媒體、在地體驗等非高校因素也形成了多維消解機制。

第六章考察媒體環境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從理論機制切入，經由媒體環境分析，落腳於實證檢驗，系統闡釋影響路徑、認同張力與效應強度。媒體通過雙重路徑對個體的國家認同產生影響：一是通過話語框架設置與敘事策略建構關於國家的集體記憶與意義歸屬，二是經由「行動性」與「非行動性」政治參與的差異化媒體使用產生分化的認同效應。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媒體環境存在內地主流媒體「成就敘事」與香港部分媒體「問題敘事」的結構性張力，同時社交媒體「算法繭房」與「沉默螺旋」效應對在粵香港大學生的國家認同產生複雜影響。實證數據顯示，超過七成在粵香港大學生承認媒體對其內地認知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作用，且媒體因素正向強化其地域認同感，形成「國家認同弱化、本土認同強化」的認同格局。

第七章聚焦同輩交往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機制。研究基於社會化理論，闡明同輩交往通過認知重構、情感聯結與資訊中介三重路徑影響國家認同建構。對在粵香港大學生而言，與香港同輩朋友的交往構成其「情感安全區」，在為其提供心理支持的同時可能強化既有身份邊界；而與內地同輩朋友的交往則通過打破刻板印象促進國家認同積極重構。然而實證數據顯示了悖論：儘管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交往意願

和印象分較高，該因素卻對國家認同呈負向影響。這一張力體現在粵香港大學生與內地學生當前交往陷入「表層融合」和「深層區隔」的結構性困境。據此本部分指出，羣際接觸是提升國家認同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內地高校需推動兩個羣體交往從「自發性」向「引導性」轉化，在平等接觸中嵌入價值引導，在情感聯結中深化理性對話。

基於前文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各影響因素的系統分析，第八章從制度、文化、教育、媒體與交往五個維度構建提升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對策體系。國家認同培育需超越單向灌輸模式，通過制度賦能、文化浸潤、教育深耕、輿論優化與交往深化協同發力，使在粵香港大學生在主體性覺醒中將國家認同內化為源於實踐體驗與羣體互動的自然生成。

本研究雖力求嚴謹，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制於研究條件，樣本主要集中於廣東省部分高校，難以完全覆蓋在粵香港大學生的整體分佈；國家認同本身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橫切面數據難以完整呈現其演變軌跡，後續研究可進一步開展追蹤調查；受研究主題所限，對性別、家庭背景、專業分佈等變量的深入分析有待後續展開。凡此種種，亦為作者未來持續探索的方向。

本書的完成得益於多方支持。謹向所有參與調研與訪談的在粵香港大學生致以誠摯謝意，感謝他們的真誠分享與信任；向協助調研工作的高校師生、相關部門同仁致以衷心感謝；向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的專業付出深表謝忱。本研究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謹此致謝。書中錯漏不足之處，概由作者負責。

筆者深知，在我國「一國兩制」事業進入新階段的今天，任何關於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討論都承載着特殊的敏感度與學術使命感。本書以實證數據說話，既不迴避問題，亦不預設結論，唯願以此研究為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培育及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文建設貢獻綿薄之力。

目 錄

前 言 / i

第一章 研究對象、核心概念與理論依據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核心概念 / 002

- 一、研究對象 / 002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005

第二節 理論基礎 / 016

- 一、理論依據：「一國兩制」 / 016
- 二、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 / 025
- 三、理論借鑒：羣際接觸理論 / 032

第二章 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實證分析

第一節 國家認同建構的理論範式與研究假設 / 039

- 一、國家認同建構的理論範式 / 040
- 二、研究假設 / 044

第二節 問卷設計和數據獲取 / 048

- 一、問卷設計 / 048
- 二、變量說明 / 049
- 三、數據獲取 / 052

第三節 樣本的結構分佈情況和描述性統計 / 054

- 一、樣本的結構分佈情況 / 054
- 二、變量描述性統計 / 055

第四節 模型建構與分析 / 057

- 一、影響因子的提取 / 057
- 二、SEM 模型的構建與實證結論 / 062

第三章 粵港澳區域經濟發展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經濟變遷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共生演化 / 071

- 一、香港經濟發展的「雙重性」特徵 / 071
- 二、經濟繁榮與「香港人」身份優越感的建構 / 074
- 三、經濟發展階段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嬗變 / 077

第二節 兩地經濟融合進程中的香港人國家認同 / 085

- 一、從「單向優勢」到「雙向融合」的經濟格局重塑 / 085
- 二、經濟格局的轉換引發香港人身份認同焦慮 / 089
- 三、部分香港青年以本土身份反抗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合 / 092

第三節 在粵香港大學生越認同灣區經濟建設對國家認同越正面 / 095

- 一、在粵香港大學生對灣區發展規劃的積極感知 / 095
- 二、從灣區認同到國家認同 / 096

第四章 中華文化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中華文化——香港和內地共同的文化根基 / 101

- 一、香港中華文化基因的根脈——嶺南文化 / 101
- 二、中華文化在香港日常生活中的深層嵌入 / 104
- 三、中華文化基因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塑造 / 108

第二節 中華文化認同在香港人國家認同建構中的核心地位 / 114

- 一、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石 / 114
- 二、香港社會中華文化認同到國家認同 / 116
- 三、香港社會中華文化認同的堅韌性與延續性 / 119

第三節	在粵香港大學生中華文化認同度越高國家認同度越高	/ 122
	一、在粵香港大學生中華文化認同的結構特徵	/ 123
	二、在粵香港大學生從體驗式文化到價值共識	/ 125
	三、中華文化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家」、「國」疏離感的彌合	/ 126

第五章 國情教育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國情教育是培養國家認同的重要渠道	/ 131
	一、國情教育為國家認同奠定「認知」基礎	/ 131
	二、國情教育是催化愛國情感的主陣地	/ 134
	三、國情教育塑造國家認同的行為自覺	/ 137
第二節	香港國民教育的發展演變	/ 140
	一、殖民管治時期的去政治化「疏離教育」 （1842–1997 年）	/ 141
	二、回歸初期「溫和的」國民教育探索與構建 （1997–2011 年）	/ 142
	三、國民教育推進遭受挫折與反思階段（2012–2020 年）	/ 144
	四、系統重塑與全面推進階段（2020 年至今）	/ 147

第三節	廣東高校國情教育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有限	/ 150
	一、內地高校面向港澳台學生開設國情教育課程情況	/ 151
	二、廣東高校的國情教育課對提升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作用並不顯著	/ 155

第六章 媒體環境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媒體因素對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構建作用	/ 163
	一、媒體通過話語框架的設置與敘事策略影響青年國家認同	/ 163
	二、「政治參與」的媒體使用影響着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	/ 166
	三、媒體類型與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構建	/ 169

第二節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媒體環境與在粵香港大學生的認同張力	/ 173
	一、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媒體環境及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拉扯	/ 173
	二、在粵香港大學生在媒體敘事「張力」中建構國家認同	/ 176

第三節	調研發現：媒體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呈負面影響	/ 180
	一、部分媒體對內地負面報道造成在粵香港大學生對內地的情感疏離	/ 181
	二、部分媒體對內地負面報道影響在粵香港大學生對內地的制度認同	/ 182
	三、媒體因素顯著地負向影響在粵香港大學生的國家認同	/ 185

第七章 同輩交往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同輩交往是影響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重要社會化機制	/ 189
	一、同輩羣體：個體國家認同建構中的非正式社會化場域	/ 189
	二、在粵香港大學生同輩交往對國家認同影響的微觀機制	/ 192

第二節	兩類「同輩」交往對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	/ 197
	一、與香港同輩朋友的交往強化了在粵香港大學生的原生身份認同	/ 197
	二、與內地同輩朋友的交往有利於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提升	/ 200
	三、兩類「同輩」影響的交互效應與認同整合	/ 203

第三節	在粵香港大學生與內地生交往對其國家認同影響的有限性	/ 206
	一、交往的「表層融合」與「深層區隔」	/ 206
	二、「內羣體」的優先影響力與認同建構的複雜性	/ 208

三、理論與實證的張力 / 210

四、超越有限性：從「自發性交往」到「引導性交流」 / 212

第八章 提升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優化路徑

第一節 完善制度環境，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發展機會 / 217

一、深化制度銜接與規則對接，破除兩地融合發展的結構性障礙 / 217

二、拓寬相關資訊的獲得渠道 / 221

第二節 以文化為媒介構建共享的價值體系 / 225

一、加強文化傳播形成價值共識 / 225

二、通過文化產業整合價值觀念 / 227

第三節 深化國情與歷史教育，強化集體記憶 / 231

一、豐富高校國情教育的內容與拓寬教育渠道 / 231

二、加強歷史教育，強化集體記憶 / 235

三、促進兩地國情教育和歷史教育資源的共享 / 237

第四節 打造共同媒體空間，重視高校校園媒體 / 240

一、打造共同的媒體空間 / 240

二、構建健康的校園融媒體 / 243

三、提升高校學生的媒體素養 / 245

第五節 優化在粵香港大學生與內地生羣體的交往交流 /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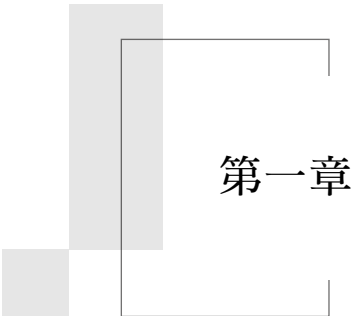
一、興趣驅動：構建以共同項目為紐帶的深度交往 / 248

二、組織賦能：發揮學校港澳社團的聯結作用 / 250

三、個體影響：重視在粵香港大學生的「意見領袖」作用 / 252

結 語 / 255

參考文獻 / 258



第一章

研究對象、核心概念
與理論依據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核心概念

一、研究對象

本著作聚焦於對廣東高校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問題的探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為粵港兩地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融合發展創造了歷史性機遇。廣東憑藉地理毗鄰、文化同源及日益提升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等優勢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北上求學。據統計，在內地求學的香港學生中，超過半數選擇廣東高校。這部分香港青年羣體將成為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的使者和橋樑，將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探討他們的國家認同現狀，既是回應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中的港澳人才需求，也是觀察香港青年與內地社會互嵌過程的關鍵窗口。

香港基於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創造了「香港奇跡」，成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也一度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最閃亮的明珠，是中國瞭望世界的窗口。全球化和現代化構成香港最主要的特色。然而耀眼的光芒下總會有些陰翳。香港城市的高度國際化帶來多元價值觀念的衝突，加之「香港全球化和現代化時期與殖民管治時期重

疊帶來的問題」，¹ 全球化給香港帶來了繁榮的同時也造成了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迷茫。回歸以來，如何培育香港青年形成正確的國家認同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

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香港特區融入內地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契機。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源自於上個世紀 90 年代。這一概念的提出歷經二十餘年，既得益於學術討論和地方政策的考慮，也是區域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結果。香港作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隨着其輻射的範圍日益廣泛，其與鄰近的廣東省合作也日益緊密。在此趨勢下，時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提出「香港灣區」。那時香港是「大珠三角」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為珠三角經濟發展做出非常大的貢獻，後來深圳的領導看到了這一發展的潛力便把深圳加進去變成了「深港灣區」。²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粵港澳大灣區並非一個全新的概念，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着的概念。在「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建設成就基礎上，我國國務院於 2017 年正式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規劃。該灣區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欲打造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羣，建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這是我國在新時代推進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實踐。我國 2019 年 2 月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羣，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進一步密切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為港

1 黎熙元（2005）。〈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社會學研究》，2005（4），189-206。

2 吳家瑋、雷鼎鳴與邵思思（2017）。〈粵港澳大灣區要着眼世界〉。《同舟共進》，2017（11），4-10。

澳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內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³

粵港澳大灣區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相比，最大的特點是「一國兩制」的特殊制度背景。這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除了具有較強的經濟、社會功能之外，還具有較強的政治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有效推進不僅為港澳特區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利益，而且對提升當前港澳青年，尤其是香港青年對祖國的認同也有着重要的意義。在新時代，推動香港青年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進而增強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不斷強化其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意識，本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粵香港大學生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潛在參與者，更是香港社會與內地互動的重要橋樑。他們的國家認同狀態，直接影響其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角色選擇與功能發揮。因此，如何通過教育環境、社會支持與制度設計有效提升其國家認同，使其成為促進香港與內地互信的積極力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的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研究，有助於了解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現狀，分析其影響機制，並為提升港澳台青年羣體的國家認同提供指導和借鑒。其次，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有利於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文建設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更好地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識形態功能和人文功能，增強香港青年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帶動香港青年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實現港澳繁榮穩定。最後，本研究亦着眼於服務國家整體戰略，通過探索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形成機制與

提升路徑，為面向港澳青年的國情教育體系提供學理依據與實踐參照，助力增強其國家意識、愛國精神與文化歸屬，從而系統性地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教育、歷史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與有效落實。

二、核心概念界定

1. 認同

「認同」作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其理論內涵的豐富性與闡釋路徑的多樣性構成了多角度理解國家認同的學理基礎。該概念經歷了從哲學思辨到實證研究的發展轉變，於不同學科視域下展現出各具特色的闡釋維度。

「認同」對應的英文術語「identity」源於拉丁文詞根「idem」，本意為「同上、相同」，最初指向事物在時空變化中保持自身連貫性的哲學命題，即「同一性」問題。至16世紀，該概念進入哲學研究範疇，主要用於探討自我與他者、個體存在之確定性的核心範疇。20世紀60至70年代，「identity」的意涵在西方學界發生關鍵性轉變，從強調「同一性」的靜態描述轉向聚焦「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⁴這一語義轉換標誌着該概念從形而上學思辨向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深度拓展，也為其進入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提供了理論契機。就「identity」的本體論意義而言，其有雙重維度內涵：一指「本身、本體、身份」，回應「我是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9）。《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取自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372.htm#1

4 柴民權與管健（2018）。〈從個體認同到國家認同：一個社會心理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18（11），76-81。

誰」的本質追問；二指「同一性、一致性」，解答「我屬於哪裏」的歸屬問題。⁵在中文語境中，「identity」常常被譯為「身份認同」，既強調身份確認的認知維度，又凸顯羣體歸屬的情感維度，較準確地傳遞了該概念的綜合意涵。「認同」本質上是對具有相同性、一致性事物的認知過程，這種認知直接關聯着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確定。因此，「認同」本質上是個體對具有相同性或一致性事物的識別與接納過程，它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是一種情感聯結與價值歸屬。正是通過這種認同過程，個體得以在社會結構中確立自身的位置，釐清自我與他者的邊界，從而在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中尋求意義的確定性與存在的連續性。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率先將「認同」概念從哲學系統性引入心理學領域。在其精神分析理論框架中，「認同」被界定為個人受到外部重要他人心理態度的影響，並將這些態度內化為自身行為規範的動態過程。通過這一內化機制，個人與外部重要他人形成具有共同心理表徵的羣體，實現了從個體心理到羣體心理的跨越。佛洛伊德的開創性工作確立了關於認同研究的基本範式——即關注個體如何在心理層面與他者建立情感與認知的趨同關係。艾里克·H·艾里克森（Erik H. Erikson）進一步拓展了認同理論的心理學維度。在其經典著作《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中，艾里克森將認同、自我與社會三者有機聯結，指出認同是青少年自我發展中的核心議題，但這一過程必須在具體社會場域中完成。艾里克森特別強調，個體認同並非純粹的心理建構，而是社會互動與歷史語境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一觀點為後續社會心理學研究奠定

了理論基礎，推動認同研究從個體層面走向社會結構層面。⁶

20世紀60年代之後，「認同」被西方學者廣泛運用於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將社會認同界定為個體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它源於個體對自己屬於某些社會羣體的知識，以及這些羣體成員資格對於個體具有的情感和價值意義。該理論揭示了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實現自我類型化的認知機制，並指出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內羣體偏好會強化羣際差異，從而鞏固個體認同。泰弗爾的貢獻在於將「認同」從個體心理層面提升至羣體關係層面，揭示了認同建構的社會比較機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則從現代性理論視角闡釋「認同」的當代特質。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紀登斯指出，現代社會中的風險性、不確定性對自我認同所依賴的信任感、親密關係等基礎機制構成挑戰，而媒介系統的全球化運作使得遠距離事件對本土自我認同產生深刻影響。⁷紀登斯的這一理論將認同研究置於現代性語境中，揭示了全球化時代認同建構的複雜性、反思性與流動性特徵，為理解當代國家認同危機提供了宏觀理論框架。

20世紀90年代以來，「認同」概念在中國學界獲得廣泛運用。《辭海》（第七版）將其解釋為兩重含義：其一，「共同認可；一致承認」，強調社會共識的達成；其二，「個人與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即在交往過程中被他人的感情和經驗所同化，或自己的感情和經驗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間產生內心的默契」，凸顯心理趨同的過程性。⁸這一定義既保留了概念

5 袁靖華（2015）。《邊緣身份融入：符號與傳播——基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調查》。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6 孫名之（譯）（2015）。《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原作者：Erik Erikson）。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作出版年：1968）

7 夏璐（譯）（2016）。《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原作者：Anthony Giddens）。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作出版年：1991）

8 《辭海（第七版）》（202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的原初內涵，又融入了中國文化對人際關係的理解。國內學者對「認同」的概念也作出了研究、梳理與歸納。江宜樺認為「認同」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同一、等同，指不同時空條件下某物與另一物為同一事物的現象，描述了事物的一貫性；二是確認、歸屬，指個體或羣體辨識自己的特色、確定自己屬或不屬於哪一種類屬的活動，表明個體或羣體的歸屬性；三是贊同、同意，指主體對某人、某事或某物持支持、贊同或肯定的態度或判斷，表達個體或羣體對事物或觀點的肯定性。⁹沙蓮香認為「認同」是用來解釋人格與社會及文化之間怎樣互動，從而維繫人格統一性和一貫性的概念；同時是維繫人格與社會及文化之間互動的內在力量，從而是維繫人格統一性和一貫性的內在力量，表示主體性和歸屬感。¹⁰

可見，「認同」是認同主體與認同客體之間複雜的關係狀態，具有三個本質特徵：一是社會性特徵，認同源於個體對羣體歸屬感、安全感和社會承認的基本需要，回答「我是誰」和「我屬於哪裏」的根本問題；二是動態性與可塑性特徵，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靜態屬性，而是隨着個體心理狀態、情感體驗以及外部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三是價值性與建構性特徵，認同形成於個體意識與客觀社會存在的相互作用中，是主體依據可獲得的社會文化資源作出的價值判斷與選擇。「認同」實際上是一種關係性概念，它既連接個體內心世界與外部社會現實，也貫通歷史傳承與當代實踐，在穩定與變化、一致與差異、自我與他者之間建構辯證統一聯繫。

2. 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作為認同理論在政治學領域的延伸，其理論內涵更為複雜，涉及民族、文化、政治等多重維度的交織互動。在全球化的當代語境中，「國家認同」既是個體歸屬感的最高層級，也是國家合法性的心理基礎。

國家認同研究興起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期，但成為國際社會科學界的熱點議題則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學界通常認為，「國家認同」作為明確的概念範疇，最早可追溯至 1953 年約瑟夫·R·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一書中的理論探討。¹¹列文森通過分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文化主義向民族主義轉型的思想歷程，揭示了國家認同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關鍵作用。20 世紀 70 年代，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系統論述了國家認同的理論內涵。亨廷頓承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關於「民族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的論斷，強調國家認同並非客觀社會現實的簡單反映，而是主觀建構的產物。¹²這一觀點突破了將國家視為純粹物質性存在的傳統認知，揭示了國家認同的符號性、建構性與政治性特質，為後續研究開闢了新的理論空間。

國內學界對「國家認同」的界定呈現多元化視角，但總體而言均把握了主觀性與客觀性兩個核心維度。主觀性體現為認同主體對國家的情感狀態、價值評價與自我歸類；客觀性則指向國家疆域、民族構成、歷史傳統、制度架構、文化體系、政治權力等要素構成的客觀實在，這些

9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中國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

10 沙蓮香（2002）。《社會心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1 劉偉、劉麗與姜鐵軍（譯）（1986）。《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原作者：Joseph Levenson）。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原作出版年：1953）

12 吳睿人（譯）（2016）。《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增訂版）》（原作者：Benedict Anders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作出版年：1983）

要素構成認同生成的認知基礎。如張春照從心理層面將「國家認同」界定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所屬國家的認知以及對國家構成的評價和情感，是族羣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昇華」。¹³ 該定義強調國家認同的心理屬性及其對次級認同的整合功能，揭示了認同層級的遞進關係。俞可平從民族文化視角提出，國家認同指「國民對本民族和本國家的語言、文化、傳統、邊界、制度、價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種自覺的認可和接受」。¹⁴ 這一定義將國家認同的物質載體（語言、邊界）與價值內核（文化、價值）有機統一，凸顯了國家認同的全方位性。江宜樺提出國家認同的「雙元結構」論，認為其「是一種主觀意識與態度，是國家歷史發展和個體社會化過程的結果，主要指公民在心理上認為自己歸屬於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心理上承認自己具有該國成員的身份資格，由此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犧牲自我」。¹⁵ 該闡釋將國家認同分解為歸屬認知、情感凝聚與行為傾向三個層面，並強調其歷史生成性與社會建構性，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框架。權麟春對國家認同的定義強調公民主體性，認為國家認同是「公民對自己集體身份的確認，包括自己歸屬於哪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族羣等一系列要素的認知、積極的評價和情感」。¹⁶ 此定義將身份確認為邏輯起點，凸顯了公民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能動作用。儘管這些學者對國家認同的定義各不相同，但是正如柴民權、管健所說「『國家認

13 張春照（2017）。〈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現狀與對策分析〉。《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2），49-53。

14 俞可平（2004）。〈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1），4-21。

15 江宜樺與李強（主編）（2003）。《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中國台北：商周出版社。

16 權麟春（2016）。〈從民族認同走向國家認同——兼論香港國民教育〉。《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3），53-57。

同是個體對所從屬的國家和民族的歸屬認知和情感依附』的意涵始終得到學者的認可」，¹⁷ 這一共識性理解抓住了國家認同的本質特徵——即歸屬認知與情感依附的統一。

綜合學界觀點，「國家認同」是對國家構成的客觀要素如疆域、民族、歷史、制度、文化、政治等的認知，主觀層面上表現出對所屬國家的歸屬意願和對國家這種集體身份的認可，並且願意為了擁有這個集體身份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它具有鮮明的雙重屬性，即客觀性維度和主觀性維度。客觀性維度體現為國家構成的物質性與制度性要素，包括領土疆域與主權邊界、多元一體的民族構成、連續發展的歷史敘事、規範運行的政治制度、積澱深厚的文化傳統、有效運轉的經濟體系等。這些客觀要素構成國家認同的「硬核」，為國家認同生成提供經驗基礎與認知框架。主觀性維度體現為公民個體的心理活動與價值判斷，包括對領土主權的認知與維護意願、對政治制度的認可與支持程度、對文化價值的接納與傳承實踐、對國家身份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為國家利益犧牲的意志與決心等。主觀性維度回答了價值論問題，是認同建構的意義性根基。「國家認同」的強弱最終取決於主觀性維度的實現程度，即公民是否將國家認同內化為自我概念的核心組成部分。

3. 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

國家認同並非單質概念，而是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複合體。這三者構成認同的「同心圓」結構，從血緣傳承到價值符號再到制度法理，層層遞進又彼此嵌套。

17 柴民權與管健（2018）。〈從個體認同到國家認同：一個社會心理路徑〉。《南京社會科學》，2018（11），76-81。

（1）民族認同

民族認同是指居住於特定地域範圍內的人們，基於體貌特徵、共同記憶、血緣關係和歷史文化傳統，對民族統一體或融合趨勢的自然性認可。這種認同具有「給定性」特徵，強調地域性與血緣性的原生紐帶。它本質上是「我們是誰」的原始答案，具有較強的情感性與先天性。民族認同常依賴共同記憶、血緣關係和歷史文化傳統，它在多民族國家中可能呈現多元樣態。在中國，民族認同既可以表現為對超越單一民族的狹隘邊界的中華民族這一「國族」的整體認同，也可以表現為對內部特定族羣的次級認同。中華民族認同是高於族羣認同的，但它並不否定各民族的差異，而是在差異的基礎上「多元統一體」的認同。民族認同可以說是國家認同的原始層面。

（2）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指民族共同體成員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對本民族基本價值、歷史文明與文化成就所形成的肯定性判斷與自豪感。它是凝聚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核心在於價值內化和符號共享。它不僅包含成員對歷史文明成就的自豪感，也包含對當下生活方式與倫理價值的認同。它本質上是對「甚麼對我們有意義」的回答。文化認同並非一種與生俱來、固定不變的本質屬性，而是一個在社會互動與歷史變遷中不斷被建構、協商與再定義的動態過程。文化認同可以說是國家認同的感情層面。

（3）政治認同

政治認同是公民對國家政治制度、法律體系、政權形態、發展道路及核心價值的理性認可與政治忠誠。它回答的是「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涉及對國家主權、憲政秩序、政府效能及意識形態的認同。政

治認同本質上是身份認同與理念認同的統一體，涉及主體對客體的身份性認定與價值性認可。政治認同的確立意味着公民將國家視為保障其權利、實現其價值的政治框架，並願意承擔相應的義務。它包括了個體在感情上將自己視為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從而產生歸屬感和依戀感，也涵蓋了個體在理性上接受並擁護該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和效能。政治認同是為國家認同中最難建立也最為核心的維度。政治認同可以說是國家認同的理性層面。

綜合來看，民族認同作為認同的歷史基礎，為文化認同提供載體與主體依託，沒有共享的民族記憶，文化認同將成無根之木；文化認同則作為中介層，將民族情感能量轉化為政治認同所需的價值資源，通過文化符號的共享與基本價值的內化，為社會共識奠定精神紐帶；政治認同作為最高層次的昇華，超越血緣與情感，將文化共同體提升為政治共同體，確立權力合法性的終極判斷。三種認同度呈現同步升降的連鎖反應：政治制度獲擁護時，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自信同步增強；政治認同一旦弱化，則必然拉低整體國家認同，逆向侵蝕文化歸屬與民族情感。任何維度的斷裂或缺失都可能引發系統性認同危機，因此國家認同建構本質上是三維協同、缺一不可的系統性工程。

4. 香港人國家認同的特殊性

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具有特殊的歷史與制度背景。由於長期受殖民管治的歷史和港英政府的「去國家化」教育，香港人的認同體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國家認同弱化問題。當回歸後遇到政治、法律、價值觀衝突時，這種「缺位」導致了認同危機和政治信任的下降。根據本課題組的調查，香港人對中華文化認同高於民族認同，更高於政治認同。許多香港人首先認同的是「香港人」這一地方身份，而非「中國人」這

一國家身份。這種「本土意識」在年輕一代中尤為突出，導致他們在面臨「內地與香港關係」問題時，傾向於從香港立場出發，而非國家立場。這種認同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在處理「兩制」關係和國家統一問題時，香港人的態度和行為往往不同於內地人。如何提升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對於香港人國家認同的培育，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強世功認為香港人國家認同的核心在於政治認同，這涉及在香港高度自治下甚麼是「愛國」、誰是「愛國者」的問題，也就轉化為香港核心價值之爭的問題，那麼提升國家認同度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從中國的國家角度來定位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為「新香港人」，即居住在香港、分享香港粵語文化的中國人，使得「一國兩制」不再只是法律上的建構，而是香港作為中國這一「命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的政治認同。¹⁸ 邢立軍、徐海波認為，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主要包含國民身份意識和對祖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認同。¹⁹ 王衡認為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可分為對經濟／市場領域的認同和對政治／民主領域的認同，也可分為歷史性的認同、文化性的認同、政治性的認同和法律性的認同。²⁰ 田飛龍認為香港對於「一國」的政治認同危機體現在「愛國愛港」是政治標準還是法律標準的爭議上，引起爭議的原因主要在於《基本法》中存在公民／居民、

愛國／愛港的雙軌區分。²¹ 綜合來看，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指香港人基於「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對國家主權、制度體系及文化價值形成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的統一體。其內容體現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政治制度的認同的有機統一，後者居於主導地位，是統攝前二者的核心支撐。具體而言，其內涵包括：對「一國兩制」政治制度及《憲法》與《基本法》構成的憲制基礎的法理認同；對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價值認同；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責任認同；對「中國人」這一集體身份的情感歸屬。

18 強世功（2010）。〈國家認同與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變遷與價值認同變遷〉。《文化縱橫》，2010（6），110-115。

19 邢立軍與徐海波（2014）。〈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和構建途徑思考〉。《寧夏社會科學》，2014（4），150-154。

20 王衡（2015）。〈國家認同、民主觀念與政治信任——基於香港的實證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3），147-161。

21 田飛龍（2015）。〈認同的憲法難題：對「愛國愛港」的基本法解釋〉。《法學評論》，2015（3），98-106。

第二節

理論基礎

一、理論依據：「一國兩制」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程中，「一國兩制」不僅是開展區域合作的關鍵制度背景，更是影響在粵香港大學生國家認同形成的重要歷史根源。故而，精準把握「一國兩制」的構想與實踐，有助於推動相關研究的持續拓展與深化。

1. 「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基本內容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實踐是中國幾代領導人立足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大局不斷進行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智慧結晶。這一構想萌芽於新中國成立後西藏和平解放時的《十七條協議》，探索於毛澤東同志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綱四目」主張，形成於鄧小平同志解決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問題的談判主張。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該協議在堅持國家主權統一的前提下，保留了西藏原有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體現了在統一國家內對不同制度安排的初步嘗試。這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的思想萌芽。此後，為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同志於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提出台灣回歸後可

「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保留「三民主義」與軍隊，中央不干預其內部制度。1963 年，周恩來將這一思想系統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是指「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意重用；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之同意後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¹ 這一主張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明確允許台灣保留原有制度和一定自治權，進一步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重要探索經驗。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面對香港、澳門回歸的歷史任務，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此前探索成果，系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完整構想，並將其成功運用於香港、澳門回歸的實踐。鄧小平提出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問題應該主要抓關鍵的三個問題：主權、政策和過渡。他強調：「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中國特色。」² 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³ 這一主張在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1997）。《周恩來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 中共中央文獻編委會（1993）。《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 中共中央文獻編委會（1993）。《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